

列寧、斯大林論國家資本主義和新經濟政策、

斯大林論蘇聯工業發展的基本路線、聯共黨史

關於價格政策問題和農業集體化政策問題的材料

中共中央辦公廳祕書處印
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翻印

一九五三年九月



編輯說明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摘錄列寧、斯大林論國家資本主義和新經濟政策的材料，以供同志們討論這些政策問題參考。

材料的次序均按寫作的時間排列。

另外，還選錄了斯大林有關蘇聯工業發展的基本路線的意見，並從聯共黨史第九章和第十一章中摘錄了兩段材料，以供同志們討論或研究價格政策問題和農業集體化政策問題參考。

陳伯達

七月六日

(一) 列寧、斯大林論國家資本主義

(二) 列寧、斯大林論新經濟政策

(三) 斯大林論蘇聯工業發展的基本路線

(四) 聯共黨史第九章關於價格政策問題的材料

(五) 聯共黨史第十一章關於農業集體化政策問題的材料

列寧、斯大林論國家資本主義

一、摘錄自列寧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關於蘇維埃當前任務的報告」

什麼是蘇維埃政權下的國家資本主義，在現時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就是把資本主義階級實行的統計和監督實行起來。在德國我們看見國家資本主義的典型，我們知道它比我們現在的經濟狀況更高，我們只要稍微想一想，如果在蘇維埃俄國有了這樣的國家資本主義基礎，那麼任何一個人，只要不是瘋子或者書呆子，都會說國家資本主義對我們就是救星。

我說，國家資本主義對我們會是救星；如果我們在俄國有了國家資本主義，我們就容易過渡到完全的社會主義，那麼社會主義就已經握在我們手中，因為國家資本主義就是集中化了的，監督化了的，和社會主義化的東西。而這正是我們所不夠的東西，小資產階級的自發性，全部俄國歷史和它的經濟所準備起來的小資產階級自發性，恰恰不讓我們走這一步，而這一步是社會主義勝利的決定步驟。……

如果小資產階級服從了國家資本主義，那麼，有覺悟的工人應當舉起兩隻手來歡迎，因為國家資本主義在克倫斯基的民主下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一步，而在蘇維埃政權下，那就是已經是四分之三的社會主義了，因為誰是國家資本主義企業的組織者，誰就可以把它變為自己的助手。……

有一些工人實行了這樣國家資本主義，事情就搞得很好，如皮業工人、紡織工人、糖業工人，因為他們以無產階級的清醒頭腦知道自己的生產，想維持生產並把生產更大的發展起來——因為在這裏社會主義最多。他們說：我們現在搞不好這樣的任務，我們讓資本家坐進去，給他三分之一的地位，並向他們學習。

當我看到左派社會主義黨人寫的諷刺話：「還不知道誰利用誰呢？我就感覺非常驚奇，為什麼他們這樣近視。當然，如果在十月革命取得政權後，從去年十月到今年四月舉行了全部反資產階級的勝利進軍後，我們還來懷疑誰利用誰——工人利用托拉斯的組織者，還是那些狡猾的商人利用工人——那末，就應當捲起被子，滾回家去，把位置讓米留柯夫和馬爾托夫。但事情並不是這樣，有覺悟的工人是不懷疑的，小資產階級的害怕是可笑的。……」（見列寧全集（俄文版）二十二卷四八二頁——四八五頁，李立三譯）

二、摘錄自列寧一九一八年五月「論『左』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

……國家資本主義，較之我們蘇維埃共和國現時情況說來，將是一個進步。假如說，經過半年，在我國奠定了國家資本主義，那麼就會是極大的成功，並且能够最有效地保證經過一年以後我國社會主義將徹底鞏固，而成為不可戰勝的。

我揣測道，一定有人義憤填膺地起來攔斥這段話……怎麼哪？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內，過渡到國家資本主義去，能會是一個進步？……這豈不是背叛社會主義麼？

……正是要求詳細講講這點。

- 第一，應該分析使我們有權有據能稱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這一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究竟是怎樣的。
- 第二，應該暴露那班看不見小資產階級經濟條件和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乃是我國社會主義之主要敵人的人們底錯誤。
- 第三，應該真正瞭解在經濟實質上是與資產階級國家迥然不同的蘇維埃國家底意義。

現在我們就來分析這三種情況。

大概，還沒有一個人在研究俄國經濟問題時，竟否認到這種經濟底過渡性。大概任何一個共產主義者也不否認：「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一語係意味着蘇維埃政權是要決心過渡到社會主義去，但總還不是承認現時經濟制度已經就是社會主義的了。

那末，「過渡」這字又是什麼意思呢？它在經濟上是不是說，在這制度中既有資本主義的，也有社會主義的成份、部分或因素呢？誰都承認，是這

樣的。但並非所有承認這點的人都思考到了：俄國現存的各種不同社會經濟結構底成份，究竟是怎樣的。問題的全部關鍵，就在這裏。

我列舉這幾種成份如下：

(一) 宗法式的，即頗大程度上是原始式的農民經濟；

(二) 小商品生產（其中包括有大多數出賣糧食的農民）；

(三) 私人資本主義；

(四) 國家資本主義；

(五) 社會主義。

俄國如此遼闊廣大，如此形形色色，以致社會經濟結構底這各種類型，都錯綜在它內面。特點也就在這裏。

試問，究竟是哪些成份佔優勢呢？在一個小農國家中，顯然是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佔優勢，而且它也不能不佔優勢：土地佔有者底大多數，甚至極大多數，乃是小商品生產者。在我國，投機商人時此時彼地在破裂國家資本主義（糧食壟斷，受國家監督的企業主和商人，資產階級的合作社手）底外殼，而投機業的主要對象，便是糧食。

主要的鬥爭正是在這一方面開展着。如果按「國家資本主義」這類經濟名詞說來，究竟是誰同誰在進行這一鬥爭呢？是上述序列中的第四種成份與第五種成份作鬥爭麼？當然不是的。這裏，並不是國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在作鬥爭，而是小資產階級和私人資本主義共同攜手，既反對國家資本主義，又反對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抗拒任何的國家干涉、統計和監督，無論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也好，無論是國家社會主義的也好。這乃是絲毫不容爭辯的事實，許多經濟問題上的錯誤都是由於不瞭解這一事實才發生的。投機者，奸商，壟斷破壞者——這便是我國「內部」主要的敵人，即蘇維埃政權在經濟設施方面的敵人。如果說，在一百二十五年前，法國小資產者這班最顯著的最真誠的革命家，只想用絞殺個別不多的「要犯」和頒佈大批通告法令去戰勝投機商人，此種願望尙可以原諒的話，那末現在例如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對這個問題所採取的純屬空談的態度，祇能引起每個有覺悟的革命家的厭惡和嫉視而已。我們很清楚地知道，投機業底經濟基礎，乃是在俄國蔓延得非常廣泛的小私有者階層，以及在每一個小資產者那裏都有自己的代辦的私

人資本主義。我們知道，這小資產階級多頭蛇的千百萬觸角，此時時彼地纏繞着工人中的個別成份；投機業鑽進到了我國社會經濟生活底全部機體內，排擠國家壟斷制。

誰要看[●]不見這點，那它就恰恰因為自己的盲目無能，暴露出自己是做了小資產階級成見的俘虜……（這段引文，轉引自列寧的「論糧食稅」，見列寧文選中文版兩卷集第二卷八四六——八四八頁）

三、摘錄自列寧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論糧食稅」

社會主義無產階級處在這樣的實際經濟情況下，究竟能進行哪樣的政策呢？是把社會主義大工業生產中小農所需要的一切產品都拿給小農，去換得糧食和原料麼？這會是一個最如願的，最「正確的」政策，——這種政策我們也已經開始實行了。但是我們不能拿出全部工業品來，還遠不能拿出，也不會很快就能拿出——最低限度，當全國電氣化計劃的初批工作尚未竣之前，我們是不能拿出——這全部工業品來的。然則怎樣辦呢？或者是企圖把在千百萬小生產者存在條件下所必然發生的這種非國營的私人交換，即商業，即資本主義底一切發展，完全加以禁止，完全封閉起來。一個政黨要是試行這樣的政策，就不僅是愚蠢，而且是自殺。其所以是愚蠢，因為這種政策在經濟上是行不通的；其所以是自殺，因為試行這類政策的黨，就必然會遭到破產。應當承認，有些共產黨員正墮入這樣的政策，而在「思想、言論、行動」上，犯了錯誤。我們力求糾正這些錯誤。一定要糾正這種錯誤，不然後事將不堪設想。

或者（這是最後一種可能的與唯一合理的政策），不去企圖禁止或封閉資本主義底發展，而力圖把這一發展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軌道上去。這在經濟上是可能的，因為凡是有一般自由貿易與資本主義成份的地方，那裏——在某種形式和某種程度上——就有國家資本主義。

蘇維埃國家，即無產階級專政與國家資本主義配合、結合、滲合起來，這是否可能呢？

當然可能。我在一九一八年五月所要證明的，正是這點。我相信，我在一九一八年五月，也證明出了這點。並且，當時我就證明說，國家資本主義較之小私有者的（小宗法式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說來，乃是一個進步。在現時政治經濟情勢下，必須把國家資本主義來與小資產階級生產比

較，而人們却把國家資本主義祇與社會主義相對照或比擬，那就大錯特錯了。

全部問題——無論理論上或實踐上的問題——就是要找到正當的方法，應該怎樣把資本主義之不可避免的（在某種程度內和某種期限內是不可避免的）發展，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軌道上去，這必須賴有一些什麼條件，怎樣保證在不遠將來變國家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儘量明確地想像到，在我們蘇維埃制度內，在我們蘇維埃國家範圍內，國家資本主義實際上會是怎樣的，可能是怎樣的。

蘇維埃政權怎樣能把資本主義底發展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軌道上去，以及它怎樣「培植」國家資本主義，此種情形之最簡明的例證，就是租讓制。

現在我們這裏，大家都同意租讓制是必要的，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思索到租讓制有何意義。就所有現存社會經濟結構及其對比關係說來，蘇維埃制度下的租讓制是什麼呢？這就是蘇維埃政權，即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為了反對小私有者的（宗法式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而與國家資本主義結成的一種合同，同盟或聯盟。承租^①人，這就是資本家。他們按資本主義方式經營業務，是為要獲得利潤，他們與無產階級政權訂立合同，是為要獲得高於普通

利潤的額外利潤，或者說，是為要獲得用別的方法所不能得到或極難得到的原料。蘇維埃政權所獲得的利益，便是發展生產力，便是立刻或在極短期

內，增加生產品量。譬如說，我們有一百個某種產業、礦山、林區。我們開採不了這全部企業——我們的機器、糧食、運輸工具不夠。因為這同樣原

因，其餘各產區，我們也開採得不好。正由於大企業經營得不好和開採得不充分，以致小私有者自發勢力在各方面都加強起來：削弱附近的（以後便是

整個的）農民經濟，破壞它的生產力，降低它對蘇維埃的信仰，盜竊公物行為與大量的、範圍雖小而最危險的投機業等等。蘇維埃政權「培植」像租讓

制這樣的國家資本主義，也就加強大生產來反對小生產，加強先進生產來反對落後生產，加強機器生產來反對手工生產，增加由自己支配的（自己份內

的）大工業生產品量，加強有國家調度的經濟關係來敵對小資產階級無政府狀態的經濟關係。恰當而審慎地進行租讓政策，這無疑是能夠幫助我們迅速

（在某種不大的程度內）改良生產情況，改善工農生活，——當然有某些犧牲作代價，即要把千百萬普特極寶貴的物品交給資本家。使租讓制對我們有利益

而沒有危害，這種範圍與條件的確定，是取決於力量底對比，取決於鬥爭，因為租讓制也是一種鬥爭，是階級鬥爭另一形式底繼續，而決不是用階級和

平來代替階級鬥爭。實踐會指明出鬥爭底方式。

租讓制的國家資本主義，較之蘇維埃制度下國家資本主義底其他式樣說來，差不多是最簡單、最顯著、最明豁、最確定的形式。這裏我們與最文明

的，先進的西歐資本主義直接訂立正式的書面合同。我們確知自己的利益與損失，自己的權利與義務；我們確知租讓的期限，如果合同上規定有先期贖回的權利時，我們也確知先期贖回的條件。我們給全世界資本主義支付一定的「貢款」，在某種關係上從他們那裏實行「贖買」，同時我們却立刻獲得鞏固蘇維埃政權地位和改善我國經濟事宜的一定手段。關於租讓制這任務底全部困難歸結起來，就是在訂立租讓合同時，一切都要經過深思熟慮，以後就要善於監視該合同的執行。這裏，困難無疑義是有的，這裏，錯誤在初期定是不可避免的，但這些困難，較之社會革命底其他各種任務，就中較之發展、容許和培植國家資本主義的其他各種形式說來，還是最小的困難。（見列寧文選中文版兩卷集第二卷八五九——八六二頁）

資本主義，若與社會主義比較，確是禍害。但與中世紀制，與小生產，與聯繫着小生產者散漫性的官僚主義比較，資本主義便是福利。既然我們還無力實現由小生產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所以資本主義——它是小生產與交換底自發產物，——在某種範圍內便不可避免，所以我們也就應當把資本主義作為小生產與社會主義間的中間環節，作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途徑、方法和方式來利用（特別是要把它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底軌道上去）。（同上書八六六頁）

四、摘錄自列寧一九二二年六月「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俄國共產黨策略的報告大綱」

……在破壞不堪與經濟落後的小農國家裏，處在工人國家監督與調劑之下的資本主義底發展（也就是在所謂「國家」資本主義這一意義上說），既能加速農業立刻興旺的過程，則這種發展不但有益，而且必要（當然祇是在某種程度內）。這對於租讓制尤為正確：工人國家並不廢除任何國有制，祇是把一定的礦山、森林、油田及其他等租予外國資本家，以便從他們那裏獲得使我國能於從速恢復蘇維埃大工業的補充裝備與機器。

我們用一部分貴重產品所付給承租者的這一代價，無疑是工人國家向世界資產階級繳納的一種貢稅；我們絲毫也用不着隱諱這點，而應當明確地瞭解到，祇要能加速恢復我國的大工業，並切實改善工農生活狀況，這樣的貢稅對我們是有利的。

五、摘錄自列寧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俄國共產黨(布)

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中央委員會底政治報告」

……關於國家資本主義問題，我以爲我們刊物以及我們黨一般地都犯了這樣一種錯誤，就是我們墮入知識分子的成見，墮入自由主義，異想着如何來瞭解國家資本主義的問題，總是在舊書本上來尋找答案。而那裏所寫的，却完全不是關於這個問題：那裏所寫的乃是資本主義制度下常有的那種國家資本主義，可是任何一本書上也未曾寫到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國家資本主義。甚至馬克思關於這點連一個字也沒有提到，他去世之後也沒留下一段確切的言論和無可反駁的指示讓我們來引證。因此現在我們就必須靠自己來打破困局。如果一般地觀察觀察我們刊物上關於國家資本主義所寫的東西，猶如我在準備這個報告時所企圖作到的那樣，便可以確信地說，那裏完全沒有瞄準目標，簡直是無的放矢。

國家資本主義，據所有經濟學書上的解釋，乃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當國家政權直接控制某些資本主義企業時的一種資本主義。而我們的國家却是無產階級的國家，它依據着無產階級，給無產階級以一切政治上的優勢，並經過無產階級把下層農民（大家記得，我們是從貧農委員會開始了這個工作）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因而國家資本主義問題弄得很多人都迷惑不清。爲要不致發生這種現象起見，就須記住這一主要的東西，即我們現有的這種國家資本主義，無論在什麼理論或什麼著作中都是沒有解釋的，原因很簡單，因爲與這個名詞有關的所有一切通常的概念，都是關係於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政權的。而我們的是已脫去了資本主義軌道，但還沒有走上新軌道的社會制度，可是指導這個國家的不是資產階級，而是無產階級。我們人不願來瞭解，當我們說到「國家」時，這國家就是我們，就是無產階級，就是工人階級底先鋒隊。國家資本主義，這就是我們能够加以限制，我們能够規定它的界限的一種資本主義，這個國家資本主義是與國家關聯着的，而這國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底先鋒部分，就是先鋒隊，就是我們。

國家資本主義，這就是我們應當加以一定限制，但至今我們還不善於限制的一種資本主義。全部問題就在這裏。這個國家資本主義將是怎樣的，已經要依我們爲轉移了。我們有充分的，而且是極充分的政權；在我們支配下的經濟資料也是充足的，但是被提昇出來，爲的是要去直接管轄，去確定範

團，去劃清界限，去使其他服從自己，而不是使自己服從其他的這個工人階級先鋒隊，却缺乏技巧。這裏所需要的只是技巧，而我們却缺乏這種技巧。

須知這完全是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情況：無產階級即革命先鋒隊擁有極充分的政權，同時却有國家資本主義並存着。問題底關鍵就在於要使我們瞭解，這便是我們能够容許和應當容許的一種資本主義，是我們能够限制和應當限制的一種資本主義，因為這種資本主義對於廣大農民和那作買賣來滿足農民需求的私人資本是必要的。……（中略）我們已經過了一年了，國家在我們的手中，——而這一年來，國家在新經濟政策方面，真正是按我們的意志行動了麼？不是的。我們不願意承認這點。它不是按我們的意志行動的呢？就像一輛不聽駕駛的汽車，彷彿內面坐着有開車的人，但汽車却不是往他所指出的方向駛去，而是往某個旁人所指出的地方駛去，也不知這個是什麼人，還是祕密的、非法的、憑空來的什麼東西，或是投機商人，或是私人經濟資本家，或者是兩者一塊，——但汽車却不是完全照着，而且常常完全不照着這汽車駕駛人所想像的那樣行進。這就是關於國家資本主義問題所要牢記着的基本點。要在這個基本方面，從頭來學習；只有當這點已成爲我們絕對的心得和知覺時，我們才能担保說，我們能學會這點。

（見列寧文選中文版兩卷集第二卷九四四——九四六頁）

六、摘錄自列寧一九二三年一月六日「論合作制」

當我一寫到新經濟政策問題時，我總是引證一九一八年我寫的那篇關於國家資本主義的論文。這點不止一次地引起某些年輕同志的懷疑。可是他們所懷疑的，主要是抽象政治方面的問題。

他們覺得，生產資料屬於工人階級，國家政權也屬於工人階級，這樣的制度不能稱爲國家資本主義。但是，他們沒有看出，我之所以用「國家資本主義」這個名稱，第一，是爲了要把我們現時的立場與我在反對所謂左派共產主義者的論戰中的立場從歷史方面聯系起來，並且那時我已屢次證明出，國家資本主義會比我國當時經濟要高一些；那時我的主要目的，是要規定普通國家資本主義與我在介紹讀者去認識新經濟政策時所說到的那種特別的，甚至是完全特別的國家資本主義之間的直接聯繫。第二，實際目的，原來對我隨時都是很重要的。而我國新經濟政策底實際目的，就是要能實行租讓制；按我國條件說來，租讓制已無疑義會是一種純粹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這也就是我關於國家資本主義的推論。

但還有另一方面的情形，其中我們需要國家資本主義，或至少也需要有與國家資本主義相比擬的東西。這就是合作制問題。

無疑義的，在資本主義國家情況下，合作社是集體的資本主義組織。同樣無疑義的，在我國現時經濟實際環境內，當我們把私人資本主義企業，

——但唯一是在公有土地上，唯一是在屬於工人階級的國家政權監督下，——與徹底的社會主義企業（無論生產資料或建築企業用的土地以及整個企業都屬於國家）結合起來時，這裏也就發生了第三種企業的問題，亦即合作企業，這種企業，從原則意義上說來，以前並未起過獨立作用。在私人資本主義下，合作企業與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不同，前者是集體企業，後者是私人企業。在國家資本主義下，合作企業與國家資本主義企業不同，因為合作企業，第一是私人企業，第二是集體企業。在我們的現存制度下，合作企業與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不同，因為合作企業是集體企業，但它與社會主義企業沒有區別，因為它是建築在屬於國家，即屬於工人階級的土地上，是建築在屬於國家，即屬於工人階級的生產資料上。

當人們議論到合作社時，他們正是對於我國的這種情況，估計得不充分。他們常常忘記，由於我們國家制度的特點，我國合作社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如果把租讓制區分開來（順便說說，我國租讓事業，並沒有得到多大的發展），那麼在我們的條件下，合作制往往是與社會主義完全符合的。

現在我就來說明自己的意思。為什麼說自過文起所有舊時那些合作社提倡者底計劃都是幻想的呢？就是因為他們不估計到如階級鬥爭，由工人階級奪取政權，推翻剝削者階級底統治等基本問題，而夢想用社會主義來和平地改造現代社會。因此，我們很有理由把這種「合作制」社會主義，看成完全是幻想，是空想，而把期望用簡單的居民合作化就能將階級敵人轉為階級朋友，將階級戰爭轉為階級和平（所謂國內和平）的夢想當作甚至是庸俗不堪的東西。

從現時基本任務看來，我們無疑義是正確的，因為沒有爭取國家政權的階級鬥爭，社會主義是不能實現的。

可是，既然國家政權已由工人階級掌握，既然剝削者底政權已被推翻，加之全部生產資料（除了由工人國家臨時有條件地自願租給剝削者的那些生產資料外）都把握在工人階級手中，請看，現在的情況已發生了怎樣根本的變更。

現在我們有理由說，在我國，單純的合作制發展，就等於（只有上述一點「小小」的例外）社會主義發展，因此我們也就不得不承認我們對於社會主義的整個觀點都有了根本變更。這種根本變更，就在於以前我們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不能不放在政治鬥爭、革命和奪取政權等方面。現在這一重心

却改變了，亦即轉移到和平的，組織上的「文化」工作方面。我敢於說，假如不是國際關係，不是必須在國際範圍內要為我們的立場而鬥爭，那我們的重心就得移到文化建設上去。但若把國際關係置之不論，祇就國內經濟關係來說，那我們現在的工作重心，的確是歸結在文化建設方面。

在我們面前有兩個劃時代的主要任務。第一個任務，就是改造我們那完全從舊時代接受過來，簡直是壞透了的國家機關；在五年來的鬥爭中，我們對於這種機關來不及，而且也不能來得及認真加以改造。我們的第二個任務，就是農民中的文化工作。農民中的文化工作，如果將它當作經濟目的看待，那就正是要實行合作化。在居民完全合作化的條件下，我們也就會已安穩穩地站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但這完全合作化的條件，是包含有農民（正是廣大農民羣衆）底高度文化水準在內，即如果沒有整個的文化革命，那麼，完全合作化便是不可能實現的。

我們的敵人屢次向我們說，說我們做些沒有頭腦的事，把社會主義培植在一個文化不足的國度內。可是他們錯誤了的地方，就在於他們把我國政治、社會變革竟發生在文化變革或文化革命之先這點，看成是我們沒有從（一切迂儒）理論所墨守的那一端開始，而這文化革命現時却正擺在我們面前。

現在有了這文化革命，我國也就夠稱為完全的社會主義國家了。但是這文化革命，無論在純粹文化方面（因為我國的文盲現象）或在物質方面（因為要成為文明國家，就必須有相當發達的生產物質資料，必須有相當的物質基礎），對於我們說來，都具有不可思議的困難。（見列寧文選中文版兩卷

集第二卷一〇〇八——一〇二〇頁）

七、摘錄自斯大林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在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

大會上關於中央委員會政治工作的總結報告」

……在我國經濟體系中有一些紛繁複雜的情形，即有整整的五種經濟結構。有一種差不多是自給經濟的經濟結構：這就是那些商品產量極少的農民經濟。第二種經濟結構就是商品生產結構，在這方面起決定作用的是農民經濟中的商品生產。第三種經濟結構就是私人資本主義，這種資本主義還沒有被打死，這種資本主義已經活躍起來，並且當我們這裏還存在有新經濟政策的時候，它將來也還會在相當程度上活躍起來的。第四種經濟結構就是國家

資本主義，我們容許這種資本主義存在，並且我們有可能按照無產階級國家的要求來對它加以監督和限制。末了，第五種經濟結構就是社會主義工業，即我們的國營工業，這裏在生產方面不是有兩個彼此敵對的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而是只有一個階級——無產階級。

我想把這五種經濟結構簡略說明一下，因為若不這樣說明一下，便很難了解我將要宣布的那些數目字，很難了解我國工業發展方向所含有的趨勢，況且關於我國制度中的這五種經濟結構，列寧曾經充分詳細地講到過，他教導我們要善於在我們的工作中估計到這幾種經濟結構間的鬥爭。

我想關於國家資本主義和關於社會主義類型的國營工業講幾句話，以便把黨內對於這個問題所發生的那些誤會和糊塗觀念消除下去。

能不能把我們的國營工業稱為國家資本主義的工業呢？不能。為什麼？因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國家資本主義，乃是存在有兩個階級的生產結構：其中一個階級是佔有生產資料的剝削階級，另一個階級是沒有生產資料的被剝削階級。不管國家資本主義具有何種特殊形式，但它按實質說終究是資本主義性的。列寧分析國家資本主義時所指的首先是租讓企業。試看看租讓企業中是不是存在有兩個階級呢？是的，存在有兩個階級。一個是資本家階級，即從事剝削和暫時佔有生產資料的租佃企業家，另一個是受租佃企業家剝削的無產者階級。至於這裏沒有社會主義成份，那是單只從如下一件事實中也可以明顯看出來的。這事實就是誰都不敢跑到租讓企業中去進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運動，因為誰都知道，租讓企業乃是一種非社會主義性質的企業，乃是一種與社會主義不相干的企業。

試拿另一種類型的企業即國營企業來看吧。這種企業是不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企業呢？不，不是的。為什麼呢？因為這些企業中沒存在有兩個階級，而只存在有一個階級，即工人階級，它由自己的國家為代表來掌握着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它不受他人剝削，因為企業中超過工資而獲得的一切都是最高限度地用去繼續擴大工業，即用去改進整個工人階級底狀況的。

有人會說，如果估計到我國企業管理機關中還存在有官僚主義殘餘，那就應該說，這終究還不是完全的社會主義。這樣說是對的，但這並不與如下一點相矛盾，即國家工業按其類型說來乃是社會主義的生產。存在有兩種類型的生產：一種是資本主義類型的生產（包括國家資本主義的生產在內），這裏存在有兩個階級，這裏是為着資本家的利潤而生產的；同時又有另一種類型的，即社會主義類型的生產，這裏沒有剝削，這裏生產資料屬於工人階級，這裏企業進行生產並不是為異己階級來創造利潤，而是為全體工人來擴大工業。列寧正是這樣說的，他說我們的國營企業按其類型說來乃是徹底社

會主義的企業。

這裏可以把我們的國家拿來比擬一下。我們的國家也是叫作非資產階級的國家，因為它按列寧所下的定義乃是新型的國家，是無產階級類型的國家。爲什麼？因爲我們的國家機關並不是如像所有一切毫無例外的資產階級國家那裏的情形那樣努力來壓迫工人階級，而是努力來使工人階級擺脫資產階級壓迫。正因爲如此，所以我們的國家按其類型說來乃是無產階級的國家，雖則在這個國家底機關中還有許多壞分子和舊時代底殘餘。列寧宣布了我國蘇維埃制度爲無產階級類型的國家，但他同時又比任何人都更加嚴厲地斥責過我們國家機關中的官僚主義殘餘。雖然如此，但他始終都肯定說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新類型的國家。應該把國家類型問題和國家體系與機關裏還保存有的那種遺毒和餘孽區別開來。同樣也必須把國家企業中的官僚主義殘餘和我們這裏所稱爲社會主義類型的那種類型的工業機構區別開來。決不能說，既然經濟機關或托拉斯裏還有錯誤和官僚主義等等，所以我們的國家工業也就不是社會主義的工業。決不能這樣說。如果這樣說，那末就連我們的國家即無產階級類型的國家，也不能稱爲無產階級的國家了。我可以舉出許多比我們無產階級國家工作得更完善更節約的資產階級機關來。但這還不是說我們的國家機關不是無產階級的國家機關，這還不是說我們的國家機關按類型說來不是高出於資產階級國家機關的國家機關。爲什麼？因爲這種資產階級機關雖然工作得好些，但它是爲資本家而工作的，而我們的無產階級國家機關，雖然它有時不免作出錯誤，但它終究是爲着無產階級利益反對資產階級而工作的。

這種原則上的區別是不能忘記的。

關於國營工業也要這樣說。決不能以目前我們國營企業管理機關中存在有並且將來還會有種種缺陷和官僚主義殘餘爲理由，決不能以存在有這種殘餘和這種缺點爲理由而忘記我們的企業按實質說來乃是社會主義的企業。譬如說，在福特所屬那些工作得不錯的企業中，也許盜竊情事要少些，但這些企業終究是爲福特工作的，即爲資本家工作的，而我們的企業，雖然這裏有時還發生盜竊現象，並且這裏的情形不是常常都很順暢，但它們終究是爲無產階級工作的。

這種原則上的區別是不能忘記的。

現在，我就要講到關於我們全部國民經濟的數目字。

農業。如果把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度的我國農業生產水準拿來和戰前即一九一三年的水準比較，那末我國農業出產總量已提高到了百分之七十一。換句話說，在一九一三年出產了等於（按戰前價格計算）一百二十餘億盧布的產品，而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度則只出產了等於九十餘億盧布的產品。明年，即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度，根據我們各計劃機關的材料來看，產品量將進一步提高到等於一百一十億盧布，即提高到等於戰前水準百分之九十一。農業正在增長着，——這就是自然要得出的結論。

工業。如果拿我國所有包括國營工業、租讓工業以及私人工業在內的全部工業來說，那末，全部工業在一九一三年間總共出產了等於七十億盧布的產品，而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度則出產了等於五十億盧布的產品，即等於戰前水準百分之七十一。據我們各計劃機關預定，明年生產總量應增加到約達六十五億盧布，即約達戰前水準百分之九十三。工業正在增長起來。它在本年度內比農業提高得更快。

（中略）

如果我們把國營工業以及各種合作社工業生產情形拿來和私營工業生產情形比較一下，那便可以得出如下的情形：在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四年度內，國營工業與合作社工業佔全年工業出產總量百分之七十六點三，而私營工業佔百分之二十三點七；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度內，國營工業與合作社工業所佔份額已等於百分之七十九點三，私營工業所佔份額却已不是百分之二十三點七，而是百分之二十點七了。

在這個時期內，私營工業所佔比重降低了。明年預定國營工業與合作社工業所佔份額將達百分之八十左右，而私營工業所佔份額則將減至百分之二十。在絕對數量方面，私營工業是有增長的，但因為國營工業與合作社工業增長得更快，所以私營工業所佔比重也就累進式地減低下去。

這就是一件不能忽視的事實，它說明社會主義工業比重超過私人工業比重這點是不容置辯的事實。

如果把國家所掌握的財產拿來與私有主所掌握的財產比較一下，那就可以看出在這一方面——我所指的是國家計劃局規定的統制數字——也是由無產階級國家佔着優勢，因為國家擁有的資金總數至少等於一百一十七億金盧布，而私有主——主要是農戶——所擁有的資金總數卻不過是等於七十五億盧布。

這一事實說明，公營經濟的基金所佔份量很高，並且這種份量與私營經濟部分的基金所佔份量相較是在繼續增長着。

然而整個說來，我國制度終究是既不能稱為資本主義的制度，也不能稱為社會主義的制度。整個說來，我國的制度，乃是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制度，這裏就產品總量來說，私有主農民的生產終歸還是佔着優勢，但這裏社會主義工業所佔的份量却在不斷地增長起來。社會主義工業所佔的份量既然不斷地增長起來，所以這工業利用本身的集中性，利用本身的組織性，利用我國存在有無產階級專政的情形，利用運輸機關是操在國家手中的情形，利用我國信用制度和銀行都是歸我們所有的情形，——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在全國生產中所佔份量逐漸增高起來的我國工業，利用着這一切情形，就邁步前進而開始使私人工業服從於它，使其餘一切經濟結構都適應於它並跟隨着它走。農村底命運本來也就是應該跟着城市走，應該跟着大工業走。

這就是基本的結論，就是我們提到我國制度性質問題，提到社會主義工業在這制度中所佔份量問題，提到私人資本主義工業所佔份量問題，以及提到小商品生產主要是農民生產在全部國民經濟中所佔份量問題時所應得出的基本結論。（見論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高級組第一冊一五二——一五八頁）

八、摘錄自斯大林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關於聯共（布）中央在第十四次大會上政治報告的結論」

布哈林底錯誤是與這個問題有關連的。布哈林的錯誤何在呢？列寧在那些問題上曾與布哈林爭論過呢？列寧肯定說國家資本主義這個概念是與無產階級專政體系相容的。布哈林却否認這一點。他認為——「左派」共產黨人也跟他一起，其中還有薩發羅夫也都認為——國家資本主義的這個概念是與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不能相容的。當然，列寧是對的。布哈林是不對的。他已承認了自己的這個錯誤。布哈林所犯的錯誤就在於此。但這是過去的事。如果他現在，即一九二五年五月間，又重複聲明說他在國家資本主義問題上與列寧有不同的意見，那末我認為這完全是一種誤會。或者是他應當直接了當地拋棄這種說法，或者是出於誤會，因為他現今在國家工業本質問題上所擁護的路綫乃是列寧底路綫。並不是列寧同意了布哈林，而是恰恰相反，是布哈林同意了列寧。正因為這樣，所以我們才擁護布哈林。（鼓掌）

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底基本錯誤，就在於他們不是用辯證方法，而是用學究態度即完全脫離歷史環境來觀察國家資本主義問題。這樣觀察問題是